

华国锋同志会见克梅集奇同志

希望中南经济合作和贸易有更多更好的发展

新华社北京二月二十一日电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
今天下午会见由执委会主席尼古拉

·克梅集奇率领的南斯拉夫伏依伏
丁那自治省执委会代表团时，希望
中南两国的经济合作和贸易经过双

方努力有更多更好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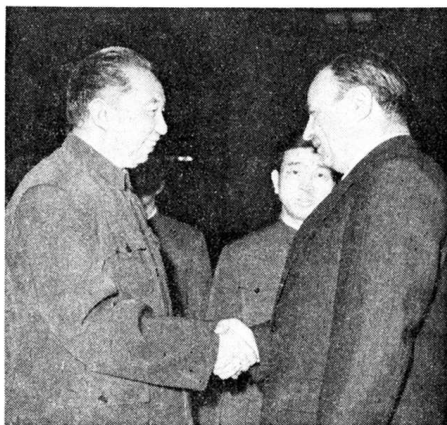
华国锋同志指出，发展两国各方面的合作关系是双方的共同愿望。他对代表团在访华期间同中国有关方面会谈所取得的成果表示满意。

华国锋同志在谈话时还高度评价了扬托总统为维护促进不结盟运动的团结，坚持反帝、反殖、反霸原则所作的贡献。他请尼古拉·克梅集奇同志向铁托总统转达他的问候。

尼古拉·克梅集奇团长指出，代表团在北京同中国方面的会谈是富有成果的，这将使南中两国在经济、科学技术、贸易方面的合作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奥斯托依奇参加了会见。会见时在座的有国务院副总理王任重，农林部长杨立功，外交部副部长张海峰，外贸部副部长陈洁，外经部副部长魏玉明等。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会见由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克梅集奇率领的南斯拉夫伏依丁那自治省执委会代表团。新华社记者 钱刚杰摄



清镇县委负责同志谈影响全县工作着重点转移问题时认为

省和地区的领导思想要解放

据新华社贵阳电

新华社记者杨锡林、肖世俊报道：最近，中共贵州省委清镇县委负责同志对记者说，全县实行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虽然已经初步条件，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这些问题主要是：

一、省、地区的领导思想不够解放，在落实农村经济政策上反反复复，顾虑重重，给下面工作影响很大。去年十月省委规定，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人、定任务、定质量、定报酬、定奖罚的生产责任制，有些适合个人完成的农活，也可以责到人。大队核算和少数规模较大的生产队，对常年作业组可以实行定产的责任制，定产到组，姓“社”不姓“资”。根据这项规

定，清镇县许多生产队很快就搞开了。不久，安顺地委一位副书记批评县委说，省委的规定有十条，为啥不全面理解？为什么就只看到定产到组这一条？叫马上刹车，不要再搞了。有些生产队开了几个晚上的会，组已分开，一切安排就绪，又不让搞了，挫伤了社员们的积极性，影响了冬季生产。省委规定，省给地、县下达农业生产计划，主要强调两条：一是产量指标，二是复种指数。省委要求复种指数达到百分之八十二以上。但是清镇县不少地土层薄，又无水源保证，两季不加一季收得不多。为此，生产队提出包产，不包复种指数。这些问题能否解决，都牵涉到领导思想是否解放。县

委主管农业的书记刘清德对记者说，现在省里是又放，又不放，深怕下面走回头路，搞资本主义。省委应该相信广大基层干部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对下面不要限制过多、过死，限制过多、过死，下面就不能甩开膀子大干，措施、办法也就少了。

二、会议太多，领导精力不够集中。据县委四名书记统计，去年一年，他们平均每人开会一百八十多天，县委副书记李喜开会多达二百四十五天。县委六个书记平均有一个全年都在上面开会。下面开了会，回到县里还要开会传达贯彻，去年一年县委贯彻上面的会议精神就开了一百二十多个会议，到会六千人次，会期加起来为四百零九天。

三、组织机构、干部配备都必须改革。目前县委、县革委有九个局、办、委，三十九个局，各种临时机构十多个，机构臃肿，层次过多，人浮于事，办事效率很低。有些事是谁都抓，谁都抓不好，甚至互相踢皮球。

四、党政不分，以党代政。清镇县委的六个书

记都兼县委办主任、副主任职务，县委常委都是县委办成员。开县委常委会、县革委会常委会都是这些人，党委和政府分开，大小事情都要找县委解决，甚至动用一百元钱的事都要请示县委。县委常委会开会各方面都要汇报情况，只好排队。由于事情太多，一开就收不了场。他们感到这种状况很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主张由一个副书记兼县委办主任，县委书记和其他四个副书记都不兼县委办职务。这样既可以加强政府工作，也可以使县委书记腾出手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加强党的政策、方针的领导。

五、加强干部培训。目前，贵州农村干部政策水平低，文化水平低，农业知识差。清镇县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有一半以上是文盲、半文盲，连文件都认不全，懂农村经营管理 and 能搞秋收的干部只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更谈不上熟悉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很不适应农业现代化的需要。因此，必须对农村干部加强培训。

停止参观活动

全力抓好春耕

编者按：“雨水”已过，全国从南到北春耕大忙季节陆续到来。当前，最要紧的是要不违农时地抓好春耕生产。为了不影响各地的生产和工作，读者建议暂停组织参观先进单位的活动，是应该引起各地重视的。

我们提一个紧急建议：立即采取措施，停止参观活动，以便让县、公社、大队的先进生产事迹在报纸上发表以后，很快就有大批人员前去参观，每天络绎不绝。仅去年十二月短的一个月内，参观人数就超过一万人。参观者不仅有四川省内的，还有贵州、陕西、湖南、山西、河南等十多个省以及中央机关和部队的高层干部。这不仅给中央机关和部队增加了负担，宜宾县革委会也很难安排参观人员的食宿问题，压力很大。同时，有些人借参观之机，游山玩水，浪费钱财，应引起注意。

现在，“雨水”已过，春耕生产从南到北陆续开始。为了不违农时地抓好春耕，建议有关部门立即停止不必要的参观活动，让广大农村干部、社员能够集中力量搞好生产，夺取今年农业丰收。

林普施委

扫除“恐‘右’症”——工作重点好转移

四川省部分地、市、县委领导干部座谈纪要

据新华社成都二月二十一日电
新华社记者包小白、郭超人、王宏伟报道：参加中共四川省委扩大会议的部分地、市、县委领导干部认为，要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必须扫除各级党委某些领导同志思想上的主要障碍——“恐‘右’症”。下面是他们几次座谈、时的发言纪要。

“恐‘右’症”的种种表现

一些同志指出，“恐‘右’症”就是在日常工作中老怕犯“右”的错误，来了运动老怕戴“右”的帽子，总之随时随地不让自己沾“右”字的边。他们说，作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如果怕的是货真价实的右，那是无可非议的。然而，那些患“恐‘右’症”的同志所害怕的并非真右。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被当作右倾而加以批判和攻击、从而弄得人们望而生畏的东西，正好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真理，是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这样，越恐“右”，在思想上就离正确路线越远，在实践上就越背离客观现实越严重。

大家认为，“恐‘右’症”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现象，是林彪、“四人帮”长期推行极左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产物。粉碎“四人帮”两年来，随着实践上的拨乱反正和理论上的正本清源，“恐‘右’症”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有所减轻。但是，大量事实表明，对于某些领导同志说，“恐‘右’症”仍然是急需进一步医治的顽症之一。要治病就要辨症。那么“恐‘右’症”有哪些症状呢？参加座谈的同志联系自己的亲身感受，列举了六个方面：

一、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本末倒置。患有“恐‘右’症”的同志不怕政治冲击一切，就怕生产挂帅怕业务技术挂帅；天天跟着叫喊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上的革命，从来不敢理直气壮地说发展生产力；重复政治口号，不解决具体

经济问题。对于这些同志来说，政治就是一切，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

二、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搞扩大化、绝对化和庸俗化。患有“恐‘右’症”的同志不怕冤枉了一百个同志，就怕“包庇”了一个坏人，宁可对同志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愿别人说他“心慈手软，态度暧昧”。由于长期受所谓“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和“事事不离纲和线”的影响，在工作中习惯于用阶级斗争解释一切，代替一切，掩盖一切，把思想问题、学术争论、意见分歧都统统说成是阶级斗争，结果搞得好人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好象进了地雷区，提心吊胆，人人自危。

三、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搞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患有“恐‘右’症”的同志不怕平均主义，就怕两极分化；不怕农民少吃少穿，就怕农民富起来。这些同志错误地认为：“穷光荣，富有罪”，“穷是社会主义，富是资本主义”。从这种错误的看法出发，常常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当成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把社员的自留地和家

庭副业视为“资本主义尾巴”，把靠劳动发家致富的社员说成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把增加集体收入提高群众生活水平说成是“打着集体旗号的资本主义”、广汉县委书记常光南认为，当前，在分配问题上仍有不执行党的“三兼顾”政策，只顾国家或集体，不顾社员收益的情况，仿佛国家拿得愈多愈是社会主义，农民分得愈多愈是资本主义。粉碎“四人帮”以后，广汉县采取措施缩小小工业产品的“剪刀差”，使农民增加了收入。这个县由于生产不断发展，去年国家的财政收入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一百多万元。但是这样于国于民都很利的事情却遭到上级业务部门的反对，要追查县委的责任。

四、在生产管理上，不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硬要“逼着公公平下仔”，“赶着鸭子上架”。大家回顾了前几年省上个别负责人在生产上瞎指挥的情况。当时，他们不作调查研究，不管水利、气候等客观条件，硬性规定推广双季稻，把双季稻说成是“革命稻”、“方向稻”、“路线稻”和“战备稻”，不种的就是“立场问题”、“觉悟问题”，就要挨批判，受处分。梁平县总共只有五十多亩耕地，他们下令要搞三十多亩双季稻，结果只种了二十多亩，就给全县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广大社员吃饭都成了问题。直到今天，不少搞农村工作的干部还不敢实行定额工分、分组作业、定工定产、超产奖励等，他们对这些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措施充满了怀疑和顾虑。

五、在发展党员、使用干部上搞反动血统论和唯成分论。患有“恐‘右’症”的同志在党路上只讲出身，不问表现；在干部路线上只讲成分，不讲德才。对个人出身要追三代以上，对社会关系要调查九族以外。他们不敢发展出身不好的党员，怕人说“招降纳叛”，不敢使用成分不好的干部，怕人说“重用坏人”，不敢大胆落实党的政策，怕说是“为坏人翻案”。在有些地方，对许多明显的错案、假案、冤案至今不敢彻底底解决。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在写结论时也要前面肯定运动的主流，后面栽上一根尾巴，免得犯所谓否定运动的错误。南充地区武胜县有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人称“杨大包容”，是全县有名的劳动模范。他参加全国群英会，曾得奖三百元，回队后交队二百元，全大队干部吃掉了三十元，自己留了七十元。就因领了这七十元钱，“四清”中被定为“贪污犯”，受到撤职处分并开除党籍。多少年来，全县的干部和群众为他鸣不平，地委和县委也明知处理得不平，但因害怕“否定四清运动成果”，一直不敢落实政策。直到去年，地委才下决心在全区范围内给“杨大包容”平了反。

六、在作风上把共产党人的革命原则抛在一边，按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生哲学处世。患有“恐‘右’症”的同志通过切身身体验，感到“说真话危险，说假话保险”，于是便“看脸色行事，看风向表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做事不如不做事”，“遇到问题绕道走”，“逢人只说三句话”。

产生“恐‘右’症”的根源

一些同志提出，我们许多共产党员在战争年代不畏枪林弹雨，不怕流血牺牲，为什么在和平时期却患上了“恐‘右’症”？这说明“恐‘右’症”的产生是有着复杂的历史根源和社会背景的。他们认为，党内思想僵化和半僵化状态的形成，思想上的“恐‘右’症”的出现，追根求源，有三个问题值得认真研究：一、理论上的一系列混乱、偏差和谬误，是导致“恐‘右’症”的思想根源。成都市的同志们说，过去，我们党一直讲两条战线的斗争，是右倾就是右倾，有“左”倾就反“左”倾，这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形成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下转第四版）



项工程云南元江县落草挖建在农村的各质量好。这是城关公社社员在搞秧。

新华社记者 朱子潮撰

冶金战线职工挖掘潜力增产节约

钢铁生产一月份超额完成计划

本报讯 冶金战线坚持挖掘内部潜力，从节约中求增产，今年以来钢铁生产又获新胜利。元月份，钢、铁、钢材、铁矿石、八种有色金属产量超额完成国家计划。产品日产量超过了去年第四季度的水平，钢的月产量创历史最新纪录，产品质量也有提高。

党的三中全会精神给冶金战线职工极大鼓舞。各企业领导决心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生产建设上，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切实转移工作中心。鞍山钢铁公司各级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抓住关键，加强指挥，一月份，九种

主要产品都超额完成计划。钢日产量平均保持在两万吨左右。太钢工人开展劳动竞赛，你追我赶，主要产品不仅完成了计划，而且干出了今年增产要求的水准。

今年以来，冶金战线生产取得新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坚持挖掘内部潜力，从节约中求增产。广大冶金职工千方百计节约能源。上海冶金局各厂为了克服电力不足的困难，采取了灵活组织生产的办法，一月份，钢、铁、钢材产量都超过了计划。本钢一月份每天缺电四、五十万度，他们发动群众提高自备电厂的出力，每天

多发电四十八万度，保证了主要产品全面完成计划。全国电解铝厂、重点铁合金厂、特殊钢厂等这些“电老虎”一月份共节电一千七百多万吨。包钢大力降低能源消耗，去年高炉煤气放散率由百分之十一降到百分之九点一，今年又采取一项技术措施，使高炉煤气放散率降到了百分之五以下。首钢炼钢厂使烧结矿燃料比下降了百分之十二。一月份重点钢铁企业节约焦炭三万八千吨，钢铁料三万四千吨，重油一万七千吨。

冶金战线生产取得新胜利的一个原因，是针

对生产薄弱环节，积极组织攻关。轧钢开坯是钢铁工业薄弱环节之一，今年以来各轧钢厂大搞技术革新，深挖潜力。一月份，轧钢开坯产量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不但吃掉了当月生产的全部钢铁，还吃了部分冷钢锭。今年以来，钢铁工业扭转了积压新钢锭的局面，做到钢锭必成材。首钢炼铁厂、鞍钢十七号平炉、老钢和首钢的轧机在老设备上干出了生产新水平。中钢一厂、二厂、三厂的中型轧机，积极采用先进技术，实现了程序控制，提高了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特殊钢厂今年已在十八座电炉上推广双层全水冷挂渣炉壁的最新技术，提高了电炉炉壁寿命，为一月份多炼特殊钢、节约耐火材料做出了贡献。

西藏发现大型铬铁矿

新华社拉萨二月二十一日电 西藏地质工作者在西藏高原发现多处储量、品位很高的铬铁矿。这些铬铁矿还普遍伴生有贵重的铂族元素。

西藏铬铁矿的发现，为我国冶金工业将提供重要原料。西藏铬铁矿是西大、品位很高的铬铁矿。这些铬铁矿还普遍伴生有贵重的铂族元素。

舟山水产冷库建成投产

新华社杭州二月十七日电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之一的舟山水产冷库，在去年十二月底提前建成，并投入了试生产，已经生产出一批冻鱼。

舟山水产冷库坐落在沈家门渔港之滨。全厂占地面积八万多平方米，由三十多个单项工程组成。主库是七层建筑，高近五十米，结冻、制冰、冷藏、冰库全部工序都集中在主库里。冷库每天能冻结鲜鱼二百四十九吨，制冰二百四十吨。冷藏库一次的容量达五千二百多吨。储冰库一次容量六千八百多吨。为保证鱼货质量，从码头到理鱼车间，设有地下输送机运输。

这座冷库建成投产，每年可减少烂鱼五千吨。这将促进舟山水产生产的发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伙利用他们窃取的那部分权力，首先从几家重要报刊入手，发起了一场对所谓“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的“批判”，其规模之大，来势之猛，调门之高，在建国以来思想战线历次运动中是罕见的。五月八日，江青一伙化名“高炬”、“何明”，同时抛出两篇定调的文章，疯狂叫嚣要向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紧接着，他们的党羽戚本禹、林杰之流蜂拥而上，对《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大打棍子，大扣帽子，发动了全力围剿。五月十日，姚文元在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抛出了黑文《评“三家村”》。全国报刊，都奉命转载。这场围剿，是这帮隐藏在党内的大奸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精心制造的一场更大的文字狱，是他们扭转文化大革命方向，改变文化大革命性质的一个重要步骤。

这场反革命的文字狱使《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作者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惨遭迫害。邓拓同志很快就被迫含冤而死；吴晗同志在残酷的打击迫害下，也离开了人世。林彪同志在精神和肉体上也遭受了极大的创伤。林彪、“四人帮”一伙不仅“株连九族”，而且实行“瓜蔓抄”，用所谓“支持三家村”的罪名，迫害北京市委的许多领导干部，以及《北京日报》、《前报》、《北京晚报》的领导干部和编辑人员。不少省市的报刊因为也办过一些类似的专栏，许多作者也因为写过几篇文章，便同样遭到迫害。林彪、“四人帮”一伙就是用这种狼毒残暴的手段，使我国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

林彪、“四人帮”对邓拓同志、廖沫沙同志和吴晗同志的所谓“批判”，纯属政治诬陷。现在，我们应当把加在这三个本来面目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推倒，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为“三家村”伸冤平反！

一张凭空捏造的“时间表”

反动刊物姚文元在《评“三家村”》一文的开头，就耸人听闻地给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同志的写作活动定下性质，说什么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为了证明这一假说，姚文元“经过精心策划”，并列了一张“三家村”怎样开伙、怎样造敌、怎样退却的“时间表”，据说“只要一看时间表，立刻可以得到异常深刻的印象”。但是，人们只要把这张“时间表”同“三家村”的全部写作活动对照起来看一看，就会发现，这完全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诬陷。

一九六一年春节前后，《北京晚报》约请廖沫沙同志写了一篇迎春专稿，搞好农业生产的杂文《“腊鼓催春”小记》。文中引用古语中“腊鼓催春”一词，鼓励农业战线的同志们鼓足干劲搞好生产。这是一篇鼓舞干劲、文情并茂的杂文。在发表于二月份的另一篇杂文《“史”和“戏”》中，廖沫沙同志就《海瑞罢官》的演出谈“史”和“戏”的关系，他认为史和戏历来户之见很深，而吴晗同志“破门而出”了，历史家却来写“戏”，所以我说，这真是难能可贵。吴晗同志在回信中建康也能动笔写戏。这本来都是很正常的事。姚文元却无中生有地断定“三家村”“认为进攻的时机已到”、“真有点拚一拚的样子”。于是凭空捏造了所谓“摩拳擦掌”、“破门而出”要“大干”一场的卑劣手法。

邓拓同志为《北京晚报》《燕山夜话》杂文专栏写稿，是一九六一年三月至一九六二年九月的的事。在这期间，《前报》杂志开辟了《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当时，正值我国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北京晚报》编辑同志多次请邓拓同志写些杂文，激励先进，策励后进。邓拓同志有感于一些儿沉迷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里，不分惜白天光阴，便写了《燕山夜话》的首篇；《生命的三分之一》，鼓励人们应当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要浪费时间白白地浪费掉。这也是邓拓同志从事《燕山夜话》杂文专栏写作的主要目的。这篇杂文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而姚文元却说这是将要“登台”“上马”，想从腐蚀人们的“生命的三分之一”开始，直到全部生命腐蚀掉，是为“和平演变”组织力量，以便“颠覆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请看这个刀笔吏颠倒黑白到了多么可耻的地步！

《燕山夜话》问世不到一年，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认真总结建国十三年来的工作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号召大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认真实行“三不主义”，毛主席语重心长地指出：“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要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一扫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沉闷空气，人民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精神有了发扬。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许多报刊，坚决贯彻党的“双百”方针，从内容到形式，有了较大的改变。很多报纸副刊的专栏办得生动活泼，例如，《人民日报》副刊开辟了由夏衍、吴晗、廖沫沙、唐渡、孟昭等同志负责撰写的杂文专栏《长短录》。在这种比较生动活泼的政治空气的鼓舞下，邓拓同志继续利用工作之余的一段时间，在《燕山夜话》中写了一百五十多篇，在《三家村札记》中写了十八篇。吴晗、廖沫沙同志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陆续继续地为《三家村札记》和其他报刊写了不少文章。后来《燕山夜话》结集成书，前后共印行了三十万册之多，受到读者的好评。可见，“三家村”的写作活动，与党中央、毛主席倡导的社会主义民主精神和“三不主义”有密切联系，没有这些，就没有那些丰富多采、议论活跃、风格独具的杂文。姚文元闭口不谈这些重要事实，不谈毛主席的重要讲话，妄图根本否认一九六二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抹煞毛主席倡导的社会主义民主

一桩触目惊心的文字狱

——为《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恢复名誉

任文屏

编者按：最近，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决定：推倒林彪、“四人帮”一伙强加在“三家村”头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恢复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同志的政治名誉。十多年的沉冤得到昭雪，这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精神，拨乱反正的又一重要胜利。

一九六六年，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制造了轰动全国的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的文字狱。黑风所及，许多领导干部、作家和群众惨遭迫害，许多地区和单位抓了“小三家村”。现在，“三家村”的冤案已经推倒，凡是因这类事件而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都要认真予以平反。我们要从这一严重事件中吸取教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促进安定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适应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

主在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日，《北京晚报》的同志给邓拓同志送去一本《三十六计》的油印本，并要求他讲一讲“中国古代兵家用计”的事。邓拓同志应约写了一篇《三十六计》，由于其他原因，邓拓同志的杂文没有继续写下去，因此，这成了《燕山夜话》最后一篇。姚文元别有用心地说是，这是因为九月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牛鬼蛇神心惊胆战，受到极大的震动。”“三家村”局势不妙，开始了退兵”。姚文元说得活灵活现，煞有介事。天下有这种先发表声明再“溜”的事吗？何况这篇文章是写在八届十中全会之前呢！而《前报》的《三家村札记》专栏，一直保留到一九六四年七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近两年的时间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同志继续发表了大量文章。在客观事实上，姚文元完全是闭起眼睛瞎说瞎话！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二百来篇文章，多数是就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有感而发的，或褒或贬，切中时弊。也有知识小书，帮助读者增长知识，提高认识能力。还有关于学习方法、短评以及历史考证、地方掌故。《燕山夜话》中有二十八篇是读者出题目，作者写文章。有些题目，是中央负责同志出的。据当时有关的编辑同志追忆，在《燕山夜话》的文章陆续发表期间，每天都收到读者欢迎这个专栏的信件，也有个别读者对某篇文章提出不同的看法，但没有一封读者来信说是“大毒草”。难道成千上万的读者都不懂什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只有江青、姚文元才有特别的识别能力？当然不是。他们不过是以《海瑞罢官》为导火线，以“三家村”为突破口，重操秦松的“莫须有”故伎，大兴文字狱，从而攫取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为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

构织文字狱的卑劣手法

为了把“三家村”杂文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姚文元从《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二百多篇杂文中挑出二十四篇当靶子，对其余的大量作品，或装聋作哑，或含糊其词。然而，就从姚文元对这二十多篇所谓“毒菌”、“毒草”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个反动文痞是怎样采取阴险卑劣的手法来构织文字狱的。

手法之一是：寻词摘字，断章取义。

我们已经在上述“时间表”中，看到姚文元用拼凑法凑出了“三家村”如何出场的妙文。他又用同一手法，拼凑出了一个所谓“三家村”一九六二年“对形势估计”。他先从吴晗同志《说绿》，挑出一个“浪”字，再从邓拓同志一篇谈春节习俗的杂文《今年的春节》中，摘出“解冻”二字，然后强拉到一起，胡说：“浪”就是“一股冲击力和领导力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对别人的文章进行“肢解”，再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接肢”，这是姚文元的一个创造！

为了捏造邓拓同志“竭力鼓吹向鲁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学习”的罪名，姚文元抓住一篇谈接待外宾工作的杂文《交友待客之道》，从中挑出几个词，凑成了这样一句话：邓拓“鼓吹要‘学习’‘团结’‘比自己强’的国家，‘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然后便宣布邓拓“这是恶毒攻击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求把修正主义请进门，引狼入室”。这又是“莫须有”的罪名。这篇杂文的真实写作背景是：当时正在举行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各国朋友云集北京，编辑同志请作者写一篇中国人民友好待客习俗的文章，以利用好接待工作。在文章结尾，作者明明明白写着“要欢迎朋友比自己强，这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因为可以向他们学习，提高自己”。目前参加国际运动会的同志们，应该好好体会这个意思。”无奈邓拓同志指出的“这个意思”不符合姚文元的需要，于是他一刀砍下，硬把向各国运动员学习歪曲成“学修正主义”，欢迎各国运动员就变成“欢迎修正主义”了。

手法之二是：篡改微词，牵强附会。

姚文元一伙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者 and 实用主义者，他们衡量事物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是否有利于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从这种需要出发，“三家村”杂文成了他们索隐发微，牵强附会的材料。

邓拓同志的《两则外国寓言》，是被姚文元视为极其“疯狂”的黑文之一。这两则寓言，讽刺了一个声称应该将最远而实际根本不平行的运动员，又讽刺了一只只会耍干海水的山雀以及那些带着猎枪跑到海边等着钓鱼的人们。杂文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当时组稿的同志一眼就看出作者意在讽刺前不久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吹的“一国进入共产主义”“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那一番毒气。这篇杂文既骂了赫鲁晓夫，又不露痕迹，文章做得很巧妙。事情过了四年多，当事人还在，姚文元却硬说成是“恶毒地嘲笑我们党为克服困难而采取的自力更生的方针”，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专治‘健忘症’”是使姚文元认为可以抓住把柄大做文章的一篇杂文。在这篇杂文中，邓拓同志引据明代陈约《艾子后语》中的一则故事，叙述健忘症的症状，开列出各种治疗方法。由于这篇杂文没有点名讽刺对象，也没有区别“治疗”手法的性质，因而人们

可以作不同的解释。姚文元乘此空隙扣上一顶帽子，胡说“这篇文章恶毒诬蔑党的负责同志患了‘健忘症’”，用心十分险恶。其实《专治“健忘症”》中所说的“自食其言，言而无信”的这种社会现象是客观存在，对这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进行抨击又有什么过错呢？

手法之三是：混淆事物性质，无限上纲。

“三家村”杂文中，许多是歌颂党和人民革命斗争事业的，也有不少是以古喻今，对我们社会的某些现象有所批评或讽刺，有所建议和倡导。在写作手法上，有的直截了当，有的比较含蓄曲折。对我国社会生活中的某些不良现象，实事求是地进行批评、讽喻，以达到改进的目的，是社会主义民主给予每个公民的政治权利，也是一个作家对党的事业负责的表现。姚文元蓄意混淆事物的性质，把对个别领导人物作风的批评说成是对党对毛主席的诬蔑，把批评某种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说成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和攻击，把艺术风格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姚文元说来，对于任何一个“问题”，如不上升到“自觉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这个“纲”，他是绝不住手的，活现出一副政治流氓的嘴脸。

《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批评和讽刺得最多也最深刻的，是那种吹牛皮、说大话、不依客观事实、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现象。纸上谈兵的赵括，言过其实的马谡，自称活了数千岁的方士，夸口养了三三食客的季孙氏等等，就是这样的典型。作者通过这些生动的古代故事，告诉人们要引以为戒。《伟大的空话》一文，更辛辣地嘲笑了那些爱说空话的人，奉劝爱说“伟大的空话”的人们及早去“休息”。这些意见，写得尖锐辛辣，但仍然不失为一种善意的批评，今天读起来仍然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姚文元抓住文章列举的空话中有“东风是我们的敌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一句，硬说这就是“明目张胆地咒骂‘东风压倒西风’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论断是‘空话’”，从而把整篇文章说成是对毛主席思想的攻击。这一来，一方面把正常的批评打成了恶毒攻击，堵塞了言路，另一方面又为以后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伟大的空话”大开绿灯，使之泛滥成灾。

姚文元把所谓“为右倾机会主义者翻案”当成他打人的最得意的棍子，谁敢说一点真话，讲一点不同意见，谁就是反党。邓拓同志的《智谋是可靠的吗》一文，通过历史上几则故事，讽刺了那种喜欢自己逞能，不接受下面群众意见的现象，提出“任何智谋都不是神妙的，不属于少数天才的，而是属于广大群众”的。姚文元一口咬定是“皇帝”、“博采广录”，就是要党中央接受他们支持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其实，杂文中提到几个古代著名人物和帝王，无非是从领导者要注意“广谋于众”这个角度讲的，根本没有专指那一级领导机关或那位领导人；退一步来说，即使这些意见就是专讲给党中央、讲给领导人听的，又有什么了不得呢？难道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不

扼杀创作的帮规种种

赵云声

“四人帮”为了扼杀文艺创作，制定了种种帮规。只要触犯了它，就要被打下文字狱中。深受其害的作家和诗人，其数量之多，古今外都是罕见的。帮规名目繁多，在文艺史上也是少有的。

报告文学，是一种专门描写真人真事的形式。可是，叛徒江青却说：“我们历来不赞成文艺创作写真人真事，就是报告文学，也不要多写活着的真人。”从此，凡文艺作品，都不许写真人真事。这样一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出现来的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统统不能描写、不能歌颂了——原因是由于这些人物还不“活着”。

“活着的真人”不能写，死去英雄能不能写呢？石油工人的杰出代表王进喜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四人帮”非但不许歌颂，反而还要攻击。某电影制片厂的同志提出要写女英雄刘胡兰，“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一个亲信蛮横地回答：“死去的人也不要写。”

那么，塑造典型人物总该可以了吧？也不行！于会泳说：现在“完全直接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已经

应该听取群众的意见吗？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就不伟大、光荣、正确了吗？姚文元表面上是在维护党中央，实质上是把党中央同群众隔绝开来，把党中央描写成虚弱得连一点群众不同意见都经受不了。

姚文元把“三家村”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店”所使用的手法，是林彪、“四人帮”一伙的看家本事，是他们对人民实行“全面专政”，建立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王朝的一个法宝。从《评〈海瑞罢官〉》到《评“三家村”》，从《评周扬》、《评陶铸的两本书》，直到九年之后的《评三项指示为纲》，使用的都是这种构陷之术。这一点也不奇怪，既要加害于人，又没有什么根据，只好乞灵于造谣、诬陷了。

篡党夺权的严重步骤

《评“三家村”》，是林彪、陈伯达、江青、姚文元一伙野心家篡党夺权全盘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是他们在全国大规模地残害革命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开端。姚文元在文章中曾经杀气腾腾地叫喊：“不管是‘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村，不管多么有名，多么有地位，是受到什么人指使，受到什么人支持，受到多少人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并要挖出什么“最深的根子”。上揪之外，还要下扫“三家村”：“在新闻、教育、文艺、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这就是说，他们一伙的屠刀不仅要杀向北京市委，而且要杀向全国各地各级党政机关，杀向文化、学术界，要横扫一切，打倒一切。果然，随着《评“三家村”》的出笼，一场政治大迫害的腥风血雨便迅速遍及全国了。

随着林彪、“四人帮”的垮台和揭批查运动的深入，他们那一套法西斯“理论”和手法也已经作为被打进历史的垃圾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应该从这一严重事件中吸取历史的教训，作为我们继续前进的一个借鉴。

这场大文字狱及其后果给我们的主要教训，就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里，绝对不可以没有民主和法制，否则，就很可能被野心家阴谋家钻空子，让他们把对敌人的专政变成对人民的专政。多年来，林彪、“四人帮”一伙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制造那么多的文字狱和政治冤案，使国家和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各方面受到严重摧残，其原因就在于无产阶级民主被践踏，社会主义的法制被破坏，人民失去了最起码的说话权利。

严酷的事实不正是这样吗？邓拓、吴晗、廖沫沙等同志，本来是堂堂正正地写文章，公开发表在报纸刊物上。他们的观点是对是错，白纸黑字，有目共睹。如果文章有缺点、有错误，也应该和只能通过批评、争论来辨清是非。然而，由于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失去了保障，林彪、“四人帮”一伙的胡言乱语竟成了“王法”。姚文元的黑棍棒一挥，就把“三家村”打成“黑店”，把邓拓打成“黑店的掌柜和总管”，把吴晗打成“急先锋”。戚本禹在一篇黑文中胡说一句“现已查明，邓拓是叛徒”，邓拓同志因此就成了“钦定”的“叛徒”！长期以来，林彪、江青、姚文元 and 那个“理论权威”胡说说是“叛徒”、“特务”、“坏人”，谁就真的被打成“叛徒”、“特务”、“坏人”。他们运用这个强盗逻辑，粗暴地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破坏党内外的民主生活准则，堵塞言路，不许人们讲话，更不许批评的话。结果，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生活中造成了许多“怕租”时期。时至今日，不少同志还心有余悸，怕帽子，怕租子，其实际就是怕不民主、怕专制横暴。我们一定要通过对于林彪、“四人帮”的彻底清算，拨乱反正，扫除迷雾，使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双百”方针真正得到贯彻落实，使人民民主真正得到发扬，促进安定团结、生动活泼政治局面的形成，以适应我们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扼杀创作的帮规种种

赵云声

“四人帮”为了扼杀文艺创作，制定了种种帮规。只要触犯了它，就要被打下文字狱中。深受其害的作家和诗人，其数量之多，古今外都是罕见的。帮规名目繁多，在文艺史上也是少有的。

报告文学，是一种专门描写真人真事的形式。可是，叛徒江青却说：“我们历来不赞成文艺创作写真人真事，就是报告文学，也不要多写活着的真人。”从此，凡文艺作品，都不许写真人真事。这样一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出现来的成千上万的英雄人物，统统不能描写、不能歌颂了——原因是由于这些人物还不“活着”。

“活着的真人”不能写，死去英雄能不能写呢？石油工人的杰出代表王进喜同志，已经离开我们多年了，“四人帮”非但不许歌颂，反而还要攻击。某电影制片厂的同志提出要写女英雄刘胡兰，“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一个亲信蛮横地回答：“死去的人也不要写。”

那么，塑造典型人物总该可以了吧？也不行！于会泳说：现在“完全直接写真人真事的作品已经

《新人骏马》等。为什么？因为《三上桃峰》写了马。一时之间，文艺界真是谈“马”色变，写“马”心惊！写“马”的作品出了问题，写“牛”的作品也跟着遭殃。湖南花鼓戏《还牛》就是这样被打成毒草的。

那么，“四人帮”究竟允许写何物呢？他们让写怪物！何谓怪物？就是那种人不象人、鬼不是鬼、头上长角、身上长项的家伙。并且给这些怪物加上顶顶桂冠。诸如：“反潮流的勇士”、“走资派”的英雄”等等。人们从这些怪物的抬手投足之中看到的，却是王、张、江、姚的幢幢鬼影。

莫把这种荒唐文学主张仅仅看做笑料，正是这类把假左外右的谬说，使我们的文艺事业遭受了空前的浩劫。但是，凡是人为的违反事物发展规律的种种怪诞，不准写这个，不准写那个，终究是不行的，最终总是要被人民所冲破的。事实难道不是这样吗？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一定如此！

